

经典回放

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消费时代的精神守望

中国文人的另类思路

张贤亮 著



张贤亮

中国文人的另类思路

张贤亮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人的另类思路/张贤亮著.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08-11360-2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2382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封面装帧 夏 芳

中国文人的另类思路

张贤亮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5 插页 4 字数 191,000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360-2/I·1126

定价 32.00 元

碎语唠叨说随笔

随笔：散文的一种。随手写来，不拘一格。中国宋代以后杂记、见闻也用此名。“五四”以来，随笔十分流行，形式多样，短小活泼，优秀的随笔以借事抒情、夹叙夹议、语言洗练、意味隽永为其特色。

发轫于“文革”之后的新时期文学，义无反顾地融入思想解放的大潮中，作家们以文学投注社会、历史、时代的质疑与思考。而以大智慧、锐利锋芒面对现代语境者，惟随笔马首是瞻。

当不少人正儿八经地以文学的名义把有趣的世界弄成无聊的人间，将原本充满审美愉悦的活动搞得枯燥乏味的时候，很多充满忧患意识和强烈使命感的随笔大家，或金刚怒目、慷慨悲歌，或棱角隐含、重剑无锋，或微言大义、皮里阳秋，却都以血写的文字，锥心刺骨的表白，臧否忠奸善恶，激扬爱恨情仇。他们随笔的深邃和宽厚又构成另一种大境界，是远比创伤性的“愤怒”与“自怜”大得多的境界。

艺术的深度就是灵魂的高度。读精彩随笔，不仅开启一扇回眸历史、眺望人间的窗口，还可澡沐精神的尘埃、滋润饥渴的心田、刺伤情感的平庸、点燃理想的魅惑。

文学是人类的精神遗存。在文化多元交融的现实语境中，一代风流，几多绝妙文章。真是“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那一篇篇浸

含着个人声音的随笔，或瞄准社会世相，直面人生，关注国运民瘼，为黎民黔首的困顿大声疾呼，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血性；或痛快冲破“言志”、“载道”的桎梏，向善求真，踔绝无羁地写人性、人情、人在宇宙时空的位置及命运；或违情越俗地写“内心世界”、“自我意识”。焦灼与苦闷、喧嚣与希望，原本就是人生饶有意味的一页。

他们是面对消费时代的精神背景，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力求超越当下精神困境的精神殉道者；他们是具有尼采式的悲剧意识、昂首问天的现代屈原。从美学观念上看，他们又是崇尚真实的，修辞立其诚，是真、善、美的传播者。

读这些睿智哲思的文字，如同与智者奇遇，这里有灵光的闪烁，有魂魄的悸动，有神奇的魅惑，有无以言说的感动，还有灵魂的拷问。

文者，纹也。在文学大家的笔下，随笔有坚硬高大的思想骨架，又有人生丰饶的血肉。题材五花八门，形式千变万化。小题可以大做，大题也可做小，信手拈来，便成妙谛。格局不求一律，风范尽可自由，包罗统汇，构成随笔美文的大博览，成为人们精神家园的一隅、重要的知识构成和难忘的审美记忆。为传统文化承传统上一捧柴薪。

汪兆骞
于北京抱独斋

目录

第一辑 文人参政	1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3
我的态度	34
中国的未来——与日本《产经新闻》记者的谈话	42
参政议政应有一定的前瞻性	46
建设文化大国	50
加强地方人大、政协在地方政治生活的作用	53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	56
拖欠民工工资应受法律惩罚	58
发展职业教育,树立多途径成才观念	61
关于筹建“文革”博物馆的提案	64
第二辑 文人经商	67
“文人下海”	69
关于宁夏旅游业	78
宁夏有个镇北堡	84
西部企业管理秘笈	106

第三辑 文人思文	133
变形语言的审美享受	135
中国文化产业概谈	137
第四辑 生活随感	155
美丽	157
大话狗儿	181
故乡行	188
国际接轨第一功——小浪底随想	198
排泄与喧嚣	204
透视中国人的英雄观	208
丫头·婆姨	210
雨·天话语——与余秋雨易中天的对话	213
玉缘	223
作家出游	226

第一辑

文人参政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乃至中国整部 20 世纪史上，其规模及深远的社会影响，我认为大大超过“五四运动”。那不是启蒙式的、由少数文化精英举着“赛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种迸发式的，是普遍受到长期压抑后的普遍喷薄而出；不仅松动了思想上的锁链，手脚上的镣铐也被打破，整个社会突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从高层和精英人士直到普通老百姓，中国人几乎人人有话说。更重要的是那不止于思想上的解放，一切都是从人的解放开始。没有人的解放，便没有思想的解放。所以，人们才将那个时期称之为“第二次解放”，并且我以为那才是真正的“解放”。

直到 1978 年底，我还在银川市附近的南梁农场劳动。职业是“农业工人”，而身份却很复杂，头上戴着好几顶“帽子”。为什么说

“好几顶”呢？头上戴着几顶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吗？难道我是傻瓜或脑袋麻木？当然不是。但那时我确实不清楚。现在我们就来算一算：一顶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两顶帽子是“实”的。“实”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进个人档案的。可是什么叫做“正式文件”，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当我在电脑上输入这些字句，想表述明白，让现在 50 岁以下的读者能够理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无能为力。这要比写小说困难得多。虽然小说有想象的、虚构的成分，但我的写作能力基本还可以胜任，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说为证。可是，如果限制我发挥想象力，不加一点虚构地描述那个荒谬的年代，真实地反映那一段历史，我必须绞尽脑汁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可是，我发现，这一来，我就陷入了要步步为营的迷魂阵。因为，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汉语就逐渐被搞乱了，汉语的词语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而被另一种“崭新”的意义替换了，更有大量的词语变得粗糙，变得模糊。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拨乱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词语上的“拨乱反正”。其中很多我们已经“反正”过来了。正因如此，所以现在我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就会让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可是其词义往往不亚于古文和现代语文之间的差别。孔子说了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被置疑了上千年，就因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们”解，而现代汉语只当“女性”和“妇女”讲，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身。因而，我觉得写这篇文章要比写小说吃力，在我企图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要把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词语也加以解释。

同时，作为一篇个人记录，我也不想从已经披露的历史材料中搜寻依据，虽然这已经很方便，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即可，并能减少难度且更为可靠。可是那样一来，文章就成了资料的堆积，失去感觉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写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真实感受。现在披露的历史材料包括种种红头文件，在当时都是极其神秘的，只有极少数人

掌握，绝大多数人只能受其摆布，即使陷入绝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无处求告。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与历史资料有出入，但它虽非“历史”却是“史实”。这是让历史学家永远头疼的难题：“历史”往往与“史实”不同。

譬如，就拿那时的“正式文件”来说吧。如果今天的中青年人用今天“正式文件”的形式去看，那绝对是非正式的，是个笑话。可是，我说中国人就曾经生活在那种“非正式”的“笑话”之中，而且长达近三十年之久，今天的中青年读者又会把我的话当作笑话。难就难在这里。

且让我用事实来说话吧。

首先，是由谁来决定某人是“右派分子”呢？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国各地各单位揪出的“右派”当然非常之多，因为那时定有指标，上级规定是按本地本单位人数的5%来“打”（你看，这个“打”字又须有注释，但类似的词语太多，此处只好从略）。因为中国人特殊的政治积极性，“打”出来的“右派”会大大超过这个百分比，所以，最后总应该有个决定性的权威机构。这个决定某人是否“右派”的机构叫做“五人小组”。各地县、处级以上单位都有这样的“五人”。可是这“五人”具体姓甚名谁，各地各单位的普通群众是不知道的。你说是主要负责人吧，可是转眼间这个主要负责人也成了“右派”，可见，还有更高层次的“五人”。总之，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别问出处，也问不清楚。

这样一下子，全国就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当时全国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数只有550万至600万。55万之说见于后来为“右派”平反的文件，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目；550万至600万之说见于1956年公开发布的统计数字。

这里，我仍忍不住想说说这个“打”字。“打”一词，在“反右运动”中是政治积极性的褒义词，我没看过当时公布有某某人被“划”为“右

派分子”一说,可是后来给“右派分子”平反时,又一律称为某某人被“错划”的说法,其实应称为“错打”才对。

好了,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这是最可靠的。

我发表长诗《大风歌》正值 1957 年 7 月,“反右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人民日报》马上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判文章《斥大风歌》。《人民日报》今天仍有很高的权威,当时简直就是“圣旨”,于是我当仁不让地成了“右派”,受到处理“右派分子”的顶级惩罚:开除公职,押送劳动教养。

“正式文件”是怎样的呢?当时压根儿没给我出示。到 1979 年我平反时,给我平反的有关单位从我的个人档案里只找到一张二十一年前押送我到劳改农场的小纸片,类似“派送单”这样的东西。我名字后面,填写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份证明我是“右派分子”的法律根据,更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因,即具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这张纸我见了,只有巴掌大,纸质脆薄,比现在公共厕所里放的最差的厕纸还差。我认识这种纸,那叫“雪莲纸”,用稻草造的,因为它不经磨损,不耐存放,一般只写个便条,写信都不用它。而这劣质的“雪莲纸”却奇迹般地在我档案中静静地陪伴了我二十二年之久,拿出来还灿然如新。

然而,麻烦也就来了,如果我是“坏分子”,我就不再专门针对“右派分子”而制订的中央文件的范围内,按 1978 年另一份中央文件精神,“坏分子”早就该“甄别”了。可是,二十二年来我明明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的。怎么办呢?

幸好,这已经是 1978 年,开始实事求是了。原来我的大麻烦,即当年《人民日报》及地方报纸、文学刊物对我的批判,又成了我是“右派分子”的证明,从而让我有资格“享受”文件精神予以平反。“不幸”与“幸”的转换,需要我等待二十二年。后来,我碰到一个当年主持把

我打成“右派”的前领导，问他当年为什么把我定为“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笑着说：你只发表了一首诗，没有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年纪又轻，我们研究了一下，尽量照顾你的政治前途，就定个“坏分子”算了，“坏分子”总离政治错误远一点吧。我理解他们的宽厚，“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中，看起来只有“坏”没有政治性。他们哪知道后来“地富反坏右分子”通统在一个菜篮子里，最后“一锅烩”了。我也笑着告诉他：到了地狱，不分你是吊死鬼还是饿死鬼，都是一律同样对待的。他却说：那不是你的一笔财富么？不然，你怎么能有今天？于是，那个“五人小组”又仿佛成了我的恩人。

这样看来，“五人小组”能网开一面，当然也能指鹿为马，把不应是“右派”的人打成“右派”。同样也说明了，当年报纸杂志上的白纸黑字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众口铄金”的功能，都可以作为罪证置人于死地。当年，众口一词很快会转化为约定俗成，大家说你是什么，你就成为什么，何必有“正式文件”！

你看，我受了二十二年苦，就因为这张薄薄的“雪莲纸”，这就是“正式文件”！

我生于1936年，但直到今天我的户口本、身份证上填写的却是1938年出生。这也来自“正式文件”。

1968年2月，我第二次劳改释放，手拿劳改农场给我开具的释放证到分配我去就业的农场报到。我去就业的这个农场也是1965年押送我去劳改的农场。这么说似乎有些绕口，干脆点说，就是我从这里出去劳改一趟又回来了。农场政治处干部看看释放证，丢给我一张纸，那是照例要填的农场工人登记表。在出生年月日一栏，我如实地填上“1936年”。干部凌厉地打量我一眼，说：你明明生在1938年，为啥填1936年？我奇怪地问：哪来的1938年？干部指着释放证说，你看，你看！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你还要赖！好像我非争取在1938年出生不可似的。我一看释放证，又是那倒霉的“雪莲纸”，

劳改农场干部用蘸水钢笔写1936的“6”时可能蘸了一下钢笔水，6在纸面上洇成了更像8而不像6。我哪敢跟干部犟嘴，他说是8就是8吧。

这个“正式文件”从此之后减了我两岁，不知是否让我多活两年。

费了这么多笔墨才大致把当年所谓的“正式文件”交代明白。这个“明白”也是我自以为是的，尚不知今天的中青年读者能否明白。回忆往事，常常用“隔世之感”这句成语，我想，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时代中的人回忆起往事有如此的“隔世”。近三十年中国的变化不仅仅是世代之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之隔。由此产生的老少之间的隔阂不止是代沟问题，根本上是阴阳两界的问题。所以，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在老少之间的交流上有我们中国人这样困难。

二

说了“正式文件”，我还要说说“帽子”。仍不用现在已经披露的历史资料，还是谈我自己的遭遇。

我的“右派”帽子如上所述，另一顶“反革命”帽子怎么来的呢？读者千万别以为我这个人特别坏，中国，在三十多年前，某人被戴上一顶“帽子”后，一不小心很快就会被戴上另一顶“帽子”，绝非我一人时运不济，亿万人都命途多舛。那时的“帽子”有如今天商场里的廉价商品，是“买一送一”的。应该说，我还是比较侥幸的一个。首先，我活下来了；其次，我还有在这里细数“帽子”的闲心，更重要的是：我毕竟有“雪莲纸”为证。更有数以万计人被当成各种“分子”受苦受难二十多年，到1978年平反时，在他或她的个人档案中却找不到“正式文件”，连一张巴掌大的“雪莲纸”也没有，从而得不到“甄别”或平反。这就是众口一词、约定俗成的厉害。当初在众人口诛笔伐、千夫所指下稀里糊涂地成了“分子”，被抓了，被关了，被开除了，被放下了……弄得穷途潦倒、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好不容易熬到命运的转折期，却

因为根本没有“正式文件”，最后只能稀里糊涂地不了了之。幸亏已是1978年以后，全国都不再讲人的出身成分、个人身份了，一致“向前看”吧，都加入到市场经济中倒腾沉浮去了。

“反革命分子”帽子，是我第一次劳改释放到农垦农场就业后，碰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戴上的。当年，每掀起一次政治运动，都以“公审大会”开路，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先给人民群众来个当头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不例外。公审哪些人呢？首当其冲的是有历史问题的人。欲抓现行，先抓历史，这是最方便的发动政治运动的方法，每次政治运动都如法炮制，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更变本加厉。“一个人不能因同一罪行受到两次惩罚”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法学原则，而三十多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反其道而行之的国家。一个人只要过去有点污点，就会不断被泼污水，弄得越来越脏。当然，还得在此类人身上抓点“现行”出来，没有一点“现行”，也不能很好地配合即将展开的政治运动。将有历史污点的人先抓出群众，就如先播下病毒，然后逐渐向外扩散，把健康人感染成病人，把普通人变成“敌人”。这是政治运动的步骤，是规律，所以建国以后不是“敌人”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

试想，要在一个人身上找毛病哪有找不出来的道理？毛泽东就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1965年我被判为“反革命分子”的“现行”有哪些呢？一是知情不报，别人说了反动话我没汇报（这个毛病至今还没有改造好）；二是破坏生产，把我在灌溉稻田时冲断一条田埂说成是有意破坏，而当时我一人管三百多亩稻田，比“革命群众”管的多得多，却长势最好；第三，我就要说件很滑稽的事情：1965年以前，就有一批在北京、天津不好好上学或是被开除、或是失业在家的中学生“上山下乡”来到宁夏农垦农场劳动。一天，在田里干活时，一个天津女“知青”看到一个农工跨过田埂就解开裤子尿尿，她在城市里哪见过这种场面，竟连带羞哭了起来。我在一旁说了一句：“嗨！你走远些嘛。你看，你在

那边尿尿，人家在这边哭哩。”这句话经分析，就成了“把知识青年的眼泪比作尿，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

今天听来令人啼笑皆非，可是当时谁都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符合逻辑的推理，连我自己都觉得我错了，至少这句劝说别人的话有很大的语病。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文化生态。今天看来既荒唐又可怕，我们可以批判它将芝麻大的事“上纲上线”，陷人以罪，然而它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历次政治运动，如“土改斗争”、“思想改造运动”、“忠诚坦白运动”、“镇反运动”、“肃清反革命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反坏人坏事运动”、“反右倾主义运动”、“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中施行的阶级斗争教育，逐渐培养出人的线性思维：人们的一切言行都可最后归结到阶级斗争上去，都能够和阶级斗争挂钩，甚至从一个人拿铁锹的姿势也可以看出此人是否劳动人民出身，从而分清“敌我友”。

千千万万中国人都曾在这种文化生态和思维方式中受害。受害者本人也抱着这种思维方式，所以受了害还觉得自己无理。

当然，“公审”不止我一个，在任何场合、任何地点，每次“公审”都是成群结队地将一批“五类分子”和有历史污点的人拉上台。“敌人”越多才越能证明形势紧迫，政治运动确有必要。那天，农场就有三十多人在台上一字儿排开。银川市法院来宣判，我判得还算轻：“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三年”。其他人有的“当场释放”，以示“宽严结合”，有的判三年、五年、八年、十五年，立即被押送到监狱去了。

法院的判决书，也就是“正式文件”呢？我没看见，至少是当时没给我看，叫我无法上诉。我只是从法院干部在台上朗朗地宣读中知道自己“罪行”的。1979年有关单位给我平反时，从我的个人档案中